

# 巴西的参与式预算与直接民主

## ——评《阿雷格里港替代：直接民主在实践中》

张梅 编写

2004年普卢托出版社 (Pluto Press) 出版了伊恩·布鲁斯 (Iain Bruce) 等人所著的《阿雷格里港替代：直接民主在实践中》(The Porto Alegre Alternative: Direct Democracy in Action) 一书。英刊《国际观点》杂志 2005年2月号刊登了亚历克斯·考珀关于该书的题为《巴西的直接民主》的书评，肯定了巴西阿雷格里港“参与式预算”的积极意义，认为它有利于制约腐败、培养人民的民主意识并最终有利于社会主义。书评主要内容如下。

肇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晚期，在大约 15年左右的时间内，巴西南部城市阿雷格里港进行了一项激进的试验：成千上万的市民参与预算决策过程，以改进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个直接民主试验被称为“参与式预算”。

该书的开始部分，是对几个基层积极分子的访谈，他们是伊恩·布鲁斯、劳尔·庞特 (Raul Pont, 前阿雷格里港市长)、乔·迈克多 (Joao Machado) 和其他巴西的左翼领军人物；书中还集中收录了他们起草的文章和广播稿。实际上，这个实践的成功，是世界社会论坛选择阿雷格里港作为主办场所的原因，同时此地也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的一个灯塔。

总之，本书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参与式预算如何运作的最佳图画。每一年在几个月中，人们在就近的街区集中，讨论决定下一年度市政预算

的优先安排，通过一系列的群众大会（在 2000年以前涉及约 3万人），他们的决定被一步步精炼并综合协调。这个程序后来推广到整个南里奥格兰德州，2002年的参与人数达到 30余万。

参与式预算是一种民主遮羞布吗？群众的赞同意见是不是成了一种对政府落后的表现的挡箭牌？参与式预算的讨论对市民而言，是不是限制而非拓宽了他们的视野？实际上在有些城市，参与式预算受左翼力量的影响很小。

但是，正如一位名叫乔斯的活动分子所言：“除公共事务之外，（参与式预算）还讨论更重大的问题……它应该在整个巴西贯彻下去，我认为这是整个世界需要的一个模式。”在最好的情况下，参与式预算是一种类似保罗·弗雷勒（巴西著名教育家，主张一种对话式的追求人性自由解放的教育方法。——编者注）解放教育方法的实践。

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里，直接民主实践仅仅限于很低的市政层面的讨论上，又能给人民生活带来多少实质改变的可能呢？因为，与大多数第三世界地区不同，巴西南部地区是这个国家最发达的地区，有相对高的税收基础。阿雷格里港参与式预算执行的最初十年里，地方税收增长了 196%。

借助于对预算的大众参与性审查，该市已经形成对腐败更有效的制约，节约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其他项目上。其结果是，当地拥有巴

西最好的公共交通服务，99.5%的人能享用高质量的饮用淡水，对占领荒地行为实行最宽大的规定，等等。

伊恩恰当地指出了参与式预算对巴西民主社会主义党（第四国际巴西分部）的重要价值。正如他们所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第四国际就已经详加论证，要在民众争取权利的斗争中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中，把满足民众的民主诉求作为一个长期的动员经验。

这些思想对当今社会运动乃至革命的意义从未如此巨大。在没有公开的辩论和讨论，

从而赢得大多数人赞同的情况下，革命无从谈起。革命无捷径可行。

民主社会主义党认为，像巴西这样的不发达国家，对民主的追求，已不可避免地成为革命的动力，它在逻辑上将导致与现存体系决裂。

[张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基础部]

(责任编辑 刘元琪)

(上接第36页)一种普遍的理论基点，而且它甚至也没有为批判理论家提供一种理解早期社会的视角。马克思主义在早期社会系统之上建构他的生产方式观念，是不合理的。在这一指责中，鲍德里亚已经使自己置身于理论薄冰之上。

他想要说的是，恰恰由于其分析模型，马克思主义忽视了早期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社会之间的根本性差异。这一生产模式看不到原始社会中交换的象征性，它把那一社会纳入到它自身的相同性之中，仅在返回到它的相对差异性中、在返回到它的欠发达的生产方式中建构了一个视角。但是宣称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不恰当性是由于它的概念的分析本质，宣称在目前基点上，无论怎样批判，都无法提供一个基础以阐明过去的结构，这招致了纯粹相对主义的危险。鲍德里亚表现出的这一困难在于，如何使激进的非连续性可以被理解。他试图主张在原始社会和政治经济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断裂，但历史的、分析的模型仅使连续性和相对差异得以认知。

对于他自己而言，鲍德里亚在最简明的概括中展示了社会系统的历史，从象征性交换的前工业社会到政治经济学，然后到第三阶段，即政治经济学的充分发展达到了对象征主义的

完全否定，第四阶段意味着我们向象征主义的回归。这一历史被非连续性所标示，本身隐含了对意义系统的分析，但鲍德里亚没有把这些要素加以理论化。换句话说，他对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批判的非完整性和含混性返回到并出现在他自己的立场上。他的批判方向被很好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的目的论和完全的连续性模型敞开了被攻击的大门，但是鲍德里亚没有向我们展示通向非连续性模型之路，既避免终结所有目前的历史，又包括尽管破碎但是某种的总体化，它能够提供一种阐明当前实践的批评基点。

总之，鲍德里亚关于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假设为激进的理论指出了前景看好的方向。它把符号学和日常生活概念结合起来，显然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选择。

#### 注 释

Jean Baudrillard,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trans Mark Poster, St. Louis: Tebs Press, 1975.

[戴阿宝：中国艺术研究院]

(责任编辑 飞 扬)